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李 丽

(鲁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 要:人们的文化视野有两种指向,即狭义的小文化和广义的大文化。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广义的社会形态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作为与社会相对的范畴,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抽象。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以及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双重尺度,规定了理解文化内涵的基本向度——事实与价值、程序与意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出发,坚定文化自信,需要从视野多维、文化自觉、继承创新、需要满足等几个方面着力。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实践;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9)06-0026-05

进入21世纪,文化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但对于文化的本质、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学界缺少起码的共识。回到马克思,深入探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其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对于我们深度把握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广义意义框架下的文化理解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理解有二:一是着眼于人类与动物界、自然界本质区别的“非自然”“非本能”的大文化;二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物质性创造活动与精神性创造活动相区别的“非物质”的小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社会相并列的范畴,是形成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纯粹的观念形态,这是狭义意义框架下的小文化观。这一理解有其合理之处,但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理解的全部。众所周知,19世纪中后期,文化人类学崛起,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意味着人改变了自己的本能式生活,创造了人的生活、人的状态、社会状态、文明状态,这是广义意义框架下的大文化观。大文化观的出场时期,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建树的黄金时期,他们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文化人类学,阅读了许多文化人类学著作,以摘要和批注的方式做了大量笔记。更何况,他们文化思想的逻辑主题

不仅是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与此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是从广义意义框架下使用文化概念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广义理解,主要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在《人类学笔记》一书中,马克思对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持赞赏态度。摩尔根根据人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期、野蛮期和文明期三个不同的时期,考察和说明的内容包括原始公社发展阶段、阶级对抗社会以及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阶段的生存技术、风俗信仰、语言文字等,还包括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和家庭关系有关的各种制度等。对此,马克思写道“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1]398}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参照马克思晚年笔记,特别是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史前各文化阶段”^{[2]32}的命题。“史前各文化阶段”的指向及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摩尔根的,只是在其基础上又增加了社会分工、家庭结构等。由此可见,“史前各文化阶段”中的“文化”与“相同文化阶段”中的“文化”,有着相同的视野,都是从社会形态意义上讲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指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各方面,涵盖社会各阶段已经发展起来的物质生产

收稿日期:2019-10-28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研究”(17JDSZK075)

作者简介:李丽(1970—),女,吉林洮安人,哲学博士,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方式、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精神创造活动;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包含其中。社会生活的全面性、立体性、丰富性,规定了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文化的总体性。

总体性的文化思想,还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述之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社会系统相比较的方式提出各文化阶段发展的不同。他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586}这里,文化时期也即社会时期、文明时期,其意义指向社会,但又非实体化的社会本身。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社会与文化相对应,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4]428}在这里,将社会与文化并提,说明两个范畴高度相关但又不等同,否则就无需两个概念了。那么,社会与文化的不同、分界到底在哪里呢?前苏联学者给出了比较恰当的解释。他们认为,“社会”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社会对象而不作进一步区分”,即“它是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在科学对象意义上尚未具体化的,尚未被科学的分析与综合理顺的整体反映在科学的术语之中”^{[5]70}。作为整体的反映,社会又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即一般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形式和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反映“既包括某些一般规律又包括一般规律所具有的不可重复的特殊性”^{[5]73}。即文化和社会反映客观现实的层次是不同的,社会属于感性具体层次,文化属于思维具体层次,作为思维具体的文化内在于感性具体的社会之中,是对感性具体的社会经由抽象、综合后所达到的共同、一般。内在于具体而又超越具体的特性,使得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一种普照的光”,穿透社会的“细胞”“肌肉”“组织”“骨骼”等,引导它们的发展,同时又对由它们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予以回应和升华。文化这种无处不在的、弥散性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是广义的。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文化理解的视野是极为广阔的,其不仅与人类改造自然、

完善自身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高度相关,亦与文明形态演进、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对于这种开阔视域下的文化思想,有学者曾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理解文化问题方式具有独特性,他们不是就文化而讨论文化,而是在更大的视域中把握文化问题……具有其他文化理论所不可比拟的理论广度和深度。”^{[6]38}

二、实践的双重尺度:文化内涵的“坐标”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广义角度使用文化概念,而且其关于人的对象化活动理论和文化实践论理论,亦给出了文化内涵的基本定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501}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和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决定了属于人的文化亦奠基与实践。文化在实践中发展,实践依循文化来建构。实践活动怎样,社会生活怎样,所形成的文化世界就怎样。

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一切实践展开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519}。但自然界以其自在态无法直接满足人的存在的需要。为了生存,人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必须对自然界加以改造,由此促成了“人化自然”的生成。“人化自然”也即通过对象化活动,客观自然界和人本身都改变了本来样态,朝向符合人的需要和理想的方向发展。这里,“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核心差别在于其被赋予的意义和价值,凝结、渗透了人的目的、要求和人对世界的掌握,进而成为“非自然”“非本能”的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一句话,文化的存在。也正因文化的注入,“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7]163},人才“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7]162}。“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就是体现着文化的作品和现实;具有类意识、类生命的人的生成,也即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的生成。

文化是非自然的,但文化不能反自然。“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161}归属于自然的本性决定了作为自然进化到人类生命体上的一种特殊展开方式的文化,理应尊重自然、贴近自然,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文化的创造,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成。尊重自然、贴近自然,一定以对自然规律的掌握与依循为前提。人

以对象化活动面对自然,而对象化活动的本质上是人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并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在这一否定性的活动中,要使人自身之外的存在变成自己活动的对象,与此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必须遵循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统一。外在尺度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结构、属性、本质和运动变化规律给人的活动所设定的范围和层次,在实践中,就是人的行动、思想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实现规律的内在化。内在尺度是由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给人的活动所设定的范围和层次,在实践中就是人的需要的满足、意义的实现。这就是说: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既遵循着客观性原则,还要符合主体性原则,是两重尺度、两重原则的共在。

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创造文化,文化也因对象化活动而自我建构。实践的两重尺度、原则,内在地规定了理解文化的两重向度:其一是回应人活动的客观性原则的事实向度,其二是反映人活动的主体性原则的意义向度。两重向度相统一的文化坐标被当代中国学者概括为“人之程序和取向”^{[8]332}。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自然界按照自身规律的恒常运行,迫使人们按照一定的程序规则约束、调节、规范自身行为,从而实现“人对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更深的自然化”^[9]。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注入信仰的那些由自然规律规制的人的活动步骤、程序等,既来自对象化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现实又突破现实的封限,能在更高的实践活动中再现自我,进而成为深藏于人类行为内部的、支配那不可预测的进化之流的完美定律。这就是文化事实向度的规定——文化程序。文化程序内化自然规律,但又与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追求着自己的目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163},即文化程序中处处渗透着主体的选择,凝聚着主体的动机,沉淀着主体对“人”的理解、感悟和设定,这就是文化意义。

对象化活动理论不仅提供了理解文化内涵的坐标,而且提供了理解文化特征的路向。文化在实践中生成,实践是文化之根。而实践是“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7]529}“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7]528}继续发展。实践的这一特性反映到文化上,即文化是有限性与无限性、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文化程序与文化意

义总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具有有限性、间断性。但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筛选、积淀下的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3]89}的存在,它们又会突破历史的限制,以“催化循环联销”和“会聚”的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再现。关于文化这一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作专门的分析。但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有关艺术哲学问题的丰富材料中,却不难发现这一主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马克思在论及希腊艺术和现代的关系时指出“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恒的魅力吗?”^{[10]49}强调过去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0]49},并不随着时间的流淌而消逝,相反,它透过时间的边界,成为“更高的阶梯”的土壤。这就说明:文化一往无前,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但是,旧文化的“最完美的地方”并没有随着“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消失,相反,它被吸收、整合到更高层次的新文化之中,并成为新文化的基础性元件,在更高的阶梯上闪烁着“永恒的魅力”。也正因此,“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才会都成为“迈向自由的一步”^{[11]120}。

三、文化自信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对象化活动为基础把握文化,不仅创新了文化理解的新高度,也对文化现实以重大指引。在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化现实是如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以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1. 视野多维。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视域下,文化有着最大的普遍性,是涵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狭义文化等“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体和各种社会活动。”^{[12]68}文化的这一广义理解提示我们,在何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为何以及如何文化自信等问题的理解上,需要有更开阔的视域、更复杂的思维。文化与社会相伴诞生、同步发展,文化内在于社会又受制于社会,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生存环境等都对文化有制约、影响作用。由此,坚定文化自信就不能局限在狭义文化内部孤芳自赏;不能与器物、制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相切割自说自话。相反,应该立足社会实践、联系社会生活,在社会建设、经

济发展、政治文明、生态保护的勃勃生机中,在文明传承、历史积淀、未来展开的时空张力中,细说文化,坚定信心,增强自豪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3]的命题,就说明了实践对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坚定文化自信不能离开伟大实践。而其反复强调的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3],三个“更”既突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关系,也蕴含着文化自信的非独立性,真正的文化自信不能脱离道路给予的“方向与路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遵循”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与保障”^[14]。

2.文化自觉。实践是文化之根,实践本性是其否定性。实践过程一方面否定了客体对人而言的外在性,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主体目的、意图的纯主观性,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进而赋予文化以间断性与连续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基于文化的特征、实践的本性,文化自信就不是线性的、简单的肯定、认同;相反,其包含着以超越为指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关键,没有自觉的自信是盲目的;反过来,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归宿,没有自信引领下的自觉就会自卑。自觉,反映的是主体觉醒、觉悟、反思、开悟的精神状态,意指人从常识性的、习惯性的、理所当然的状态中走出来,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思考。文化自觉亦离不开文化反省,“通过文化反省的途径来认识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产生的必然趋势,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15]305}。在多元文化激荡的今天,文化自觉、文化反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自识”,对本民族文化的来历、历史、实质、特征、走向等有自知之明,清楚它的方向、使命;同时对自身存在的对立面,扰动文化的反文化、打着文化旗号的非文化等时刻保持警惕;二是“互识”,在多元文明的对话协商中,熟悉不同文化形态的精神意蕴、发挥作用的整体关系框架、发展变化的轨迹与节律,既警惕文化霸权主义,同时也防止落入文化地方主义的窠臼;三是“共识”,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中,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个性,同时坚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积极参与世界共同价值的培育与创造,即“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3.传承创新。文化体系的固有属性和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作为“基因”的文化程序和作为内

核的文化意义上。文化程序是与自然规律、生物基因相类似的存在,其以浓缩的形式积聚、储存了人们掌握世界的有效信息,是文化发展的社会记忆,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7]192}。这本“书”赋予社会以有益的秩序,值得传承、续写。传承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主体自信的表现。任何传承,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主体在取舍、处理文化程序时,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把文化中储存的经典元素、优秀基因开发利用好,特别注意不要忽略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凝固、非逻辑、易耗散的文化构件,以及文化程序的“粘合剂”。续写文化,即文化创新。任何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打着特定时空的烙印,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克服局限、激发生命活力,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时空条件,进行赋意、增容、减压,即创新性继承、创造性发展,由此才会创造文化的辉煌。总之,传承与创新必须统一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创造中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汇聚中,在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中,文化才会蓬勃向前,生机无限,进而才会有自信的主体心理体验的生成。

4.需要满足。价值是文化的内核。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6]406}用“需要”来界定价值,需要的满足、意义的生成又离不开人的对象化活动,那么,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始因”以及与人的对象化活动同步生成的文化特别是文化价值的原初动因就都归结于需要。进而,作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7]194},需要也就构成文化自信的原动力。“自信主体的内在主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主体自我需要的满足程度,需要则成为文化自信生成的另一基本动力。”^[17]要生成文化自信,特定的文化形态必须满足主体的内在需要。而人的需要是递进发展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7]531}。“第一需要”和“新的需要”之间,次级需要和高级需要之间,层层推进,呈“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10]392}。由此,以需要的满足为根本来坚定文化自信,就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通过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满足方式的改进使得主体多样的、复杂的需要体系得到满足。其次,强化价值观的引导,仔细鉴别主

体需要的有效性,培育健康的、合理的、美好的需要,努力实现个人丰富多彩的发展。最后,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统一起来,把类意识、社会抱负、集体期望、政治文化诉求注入到个人需要之中,实现人的特殊存在和总体存在、社会需要的满足与“完整的人的需要”的满足的同步实现。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E·A·瓦维林,Б·П·弗法诺夫.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M].雷水生,邱守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 [6]衣俊卿,胡长栓,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2.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 [8]郭湛.社会的文化程序[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
- [9]邹广文.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J].求是学刊,2010(1).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
- [14]张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动力和方法论[J].学术研究,2019(5).
- [15]许苏民.文化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7]郑敬斌,刘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生成的动力机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Cultural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LI li

(School of Marxism,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understandings of culture: the small culture in a narrow sense and the big culture in a broad sense. Marx and Engels use the concept of culture mainly from the broad meaning of social form. As a category opposite to society, culture is the abstraction of social life. The double measure of social life's practical nature and man's objectification activity stipulates the basic dimension of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fact and value, procedure and meaning. Starting from the cultural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multi-dimensional view,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need satisfaction.

Key words: Marx and Engels; cultural thought; practi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责任编辑 雪箫)